

再论《文选》乃萧统独编而非出于众手

——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

周春艳,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探讨《文选》是出于众手还是萧统独自编撰, 先需弄清楚其编撰工作量如何与“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诸说出现之背景。跳出《文选》而将之与《文心雕龙》比观, 便知撰《文心雕龙》相关之 22 篇, 其工作量已远大于编《文选》的; 在“选学”大兴之背景下, 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穿凿附会者。将“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一类说法置于“网络中”考察, 无一经得起推敲。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上辨证可知, 《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关键词:《文选》; 《文选》编撰; 编撰工作量; “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说; 萧统独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20)01-0126-09

收稿日期: 2019-05-03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中古社会与《文选》文研究”(YCBZ2019028)。

作者简介: 周春艳(1985—), 女, 广东化州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选》研究;

力之(1956—), 男, 广西北海人,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唐前文学与文献研究。

迄今为止, 《文选》成于众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仍为学界之主流观点。支撑这一观点之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 编撰《文选》之工作量巨大, 非一人所能胜任; 其二, 唐宋时分别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萧统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之说。问题是: 就前者言, 持此说者未能跳出《文选》来考察《文选》, 而跳出《文选》来考察《文选》便不难知编辑《文选》之工作量远远小于撰写《文心雕龙》的, 即一人完全能胜任; 就后者言, 持此类说法以证明《文选》出于众手者, 更多的只是将问题放在直线条上考察而非置于“网络中”细究, 而置于“网络中”细究便不难知: 随着“选学”蔚然而兴, 有关《文选》编撰之种种传闻亦随之而来, 且其中有“不难知的误说流行千年不止”者在^①, 故此类说法难以成立。换言之, 就考究《文选》之编者到底是昭明太子一人还是“萧统与刘孝绰等”言, 二者至为关键, 然就笔者目力所及, 向来似乎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层。明乎此, 我们再来探讨迄今仍占主流的《文选》成于众手说能否成立这一“选学”之基础性问题。本来, 力之已发表过论文辩证《文选》之编撰乃昭明太子萧统一己所为而非成于众手^②, 然当时尚未充分注意到将编撰工作量如何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产生之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而将这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 更能说明问题, 且鉴于

^① 详见: 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 关于一不难知的误说流行千年不止之思考及其他》,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又, 再引同一文时略去副标题。

^② 参见: 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分别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第 6 期])。

这一问题于“选学”之重要,故今再为此小文以辨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

一 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

在笔者看来,探究《文选》是成于众手还是昭明太子独撰,弄清楚《文选》编撰工作量之大小和“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说之背景尤为重要,然向来之持《文选》成于众手说者每多忽之,故下面先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

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力之在此前之相关论文中已论证了其远不如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加上其“文之枢纽”中之《辨骚》与“剖情析采”中之《才略》这 22 篇的大^①。这里,为了更“贴近”后文之研讨,故再从另一角度略而说之。诚然,乍一看,由于《文选》与《文心雕龙》为书之性质不同,故二者之工作量如何似无可比性。然据《文心雕龙·序志》所说,可知除《序志》外,《文心雕龙》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三大部分。其中,“论文叙笔”——《明诗》至《书记》20 篇所论各文体往往涉及“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②四个层面,而“选文以定篇”之“选文”与《文选》选文即“有着实实在在的可比性”^③。另一方面,就二者涉及之文体数言,《文选》分为 39 类,《文心雕龙》之《辨骚》加《明诗》至《书记》这 21 篇则总为 36 类^④。此中,《文选》录 1—3 首者共有 23 类^⑤,而录 4 首以上者仅 16 类;至于《文心雕龙》,则只有《移檄》之“移”提及仅三家/文,而其他 35 类提及之作家/作品均多于此数。另外,“剖情析采”中“褒贬”90 余位作家之《才略》,从一定之意义上可说为全书或“论文叙笔”部分总的“选文以定篇”者。明此,便可知:编《文选》之工作量比之撰《文心雕龙》要小得多。兹为具体可感计,拟以《文选》之“诔”“碑文”“墓志”与《文心雕龙》相应之“诔碑”略作一比较。《文选》李善注本卷 56—57“诔”收曹子建《王仲宣诔》、潘安仁《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与《马汧督诔》、颜延年《阳给事诔》《陶征士诔》、谢希逸《宋孝武宣贵妃诔》等 4 家 8 文,卷 58—59“碑文”收蔡伯喈《郭有道碑文》《陈太丘碑文》、王仲宝《褚渊碑文》、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等 4 家 5 文,卷 59“墓志”收任彦升《刘先生夫人墓志》1 家 1 文;而《文心雕龙·诔碑》篇全文如下: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才,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详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愁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剏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矚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駰《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阍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雰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功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觐;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鯁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

①力之《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与〈文心雕龙〉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4页。

③力之《论〈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④《杂文》以其“《对问》”“《七发》”“《连珠》”三者替之,而不计《书记》之24种附类等。

⑤其中,“七”之《七发》《七启》《七命》与“文(策文)”之《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各均作一首计。

《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诂。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诂之区焉。

赞曰：写实追虚，碑诂以立。铭德纂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颓影岂哉。^①

按：是篇“诂”之部分——开头至“承流而作”为“原始以表末”（其中，“诂者，累也……旌之不朽也”为“释名以章义”），“扬雄之《诂元后》……弥取于功矣”为“选文以定篇”，“详夫诂之为制……此其旨也”为“敷理以举统”；“碑”之部分——“碑者，埤也……故曰碑也”为“释名以章义”，“周穆纪迹……犹封墓也”为“原始以表末”，“自后汉以来……最为辨裁矣”为“选文以定篇”，“夫属碑之体……同诂之区焉”为“敷理以举统”。而于此，刘勰说“诂”，论及扬雄、杜笃、傅毅、史孝山、崔瑗、潘岳、崔駰、刘陶、曹植等9家之文；说“碑”，论及蔡邕、孔融、孙绰等3家之作；而其论文体虽不及“墓志”，然《文选》于本体所选仅任昉1家，而任昉有多类文章为昭明太子所选录，故《文选》设此一体无需花什么工夫。简言之，昭明太子于此三者所花之工夫，至多与舍人撰《诂碑》篇之两处“选文以定篇”同。而《诂碑》篇这两者（358字）之篇幅仅为其全文（725字）之一半。^②

另外，关于《文选》编撰之工作量，陈延嘉先生在其《萧统主编〈文选〉之地位不可动摇》一文中说：

我们赞同力之编撰《文选》工作量不大的意见。我们认为，力氏把《文选》与《文心雕龙》等的工作量进行比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做法。^③

在接下的一段中，其以自己编撰文集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旁证”：

我与同窗王存信先生编著《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百篇》，是在点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严氏《全文》已经比较熟悉了。由于严氏的“全”但不收《尚书》《史记》等著作，我们又从其他著作中选取了一些。两者相加，从“选”这个角度看，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工作量并不大。花费更多时间的是其中的《题解》。我们的《题解》与刘勰的工作相差何啻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但就其评论的性质而言是有相似处的。所以我们认为，萧统在编撰《文选》时，依他的天才和知识储备，选录的取舍工作量不会很大。而选录的取舍是编撰《文选》的决定性环节，故萧统是主编毫无疑问。^④

此“旁证”乃经验之谈也，甚可佐证力之的编《文选》之工作量远小于撰《文心雕龙》之工作量说。至于陈先生之“故萧统是主编毫无疑问”说，则似未尽然。^⑤

（二）关于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问题

以“萧统与刘孝绰等撰”一类说法作为《文选》出于众手之文献支撑时，首先须要注意的是其出现之背景。否则，前提错了，演绎所得如何，可想而知。于此，我们当知隋唐间随着“选学”之兴起，各种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亦随而出焉。此中，时有类《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李纨所说的“关夫子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

①《文心雕龙义证》，第427-461页。

②在《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一文中，力之曾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相关部分——“论文叙笔”20篇加《辨骚》与《才略》分17类进行具体比较。而除这里之比较（即其“6”）外，其余16类，仅“14”之《文选》“笺”“奏记”“书”“行状”与《文心雕龙·书记》比较所得为“编‘笺’‘奏记’‘书’‘行状’所花的时间，充其量与撰《书记》篇等”外，其余15类均《文选》方面之工作量要小或小得多，且《文心雕龙》方面之各类多仅涉及其“选文以定篇”部分。

③陈延嘉主编《文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1页。

④陈延嘉主编《文学研究》第一辑，第41-42页。

⑤陈先生认为“东宫学士并非为编撰《文选》而设，但昭明太子有意编撰之后，学士协助应是合情理的”，并说“学士的协助可能在三个方面”：“1.查找资料。……昭明初步确定篇目后，这些诗文不一定都在他手边，让学士去查找。2.昭明让学士就篇目、文体等提供意见。……3.对《文选》诗文的语言进行修改。钱锺书认为……在语言修改问题上，既有昭明之为，又有文选楼学士所为。……后者，如钱氏引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二《书〈玉台新咏〉后》云：‘……裁剪长短句作五言诗，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选楼中学士之手。’”（陈延嘉主编上揭书，第43-44页。）笔者认为：其一，与参编无关；其二，“昭明让”云云只是猜测，所引材料证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其三，“文选楼中学士”说，大有问题（详参：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一文）。因之，陈先生这三点证明不了东宫学士参编《文选》。即萧统是编撰《文选》而非主编《文选》。

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①之“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者（“关夫子”，即关羽，《三国志》有传，见《蜀书》六）。如唐景龙（707—710）中人吴从政“删宗懔《荆楚岁时记》、盛宏之《荆州记》、邹闾甫《楚国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郭仲产《襄阳记》、鲍坚《南雍州记》”而来之《襄沔记》^②有云：

襄阳有文选楼，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③

而据此，便知史上将萧纲“高斋学士”误作萧统的，至晚亦当在唐初。须知，是说乃吴氏删取其前之文献来，而非其所始。“襄阳文选楼”与刘孝威、庾肩吾等萧纲之“高斋学士”二者，其均与昭明太子“造《文选》”本无瓜葛，然却被后人“穿凿”而一之。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有据”与“敬爱穿凿”牵合而一之的问题；昭明太子“造《文选》”一事，“有据”；而将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和“造《文选》”牵连在一起，则盖为“敬爱穿凿”所致。又，北宋李宗谔（964—1012）等修之《祥符图经》云：“梁昭明太子于此楼选《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威等一十余人，资给丰厚，日设珍饌，诸才子号曰‘高斋学士’。”^④是亦此类说之一显例也。

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一类说法；同时，也要正视在现存之当时文献与唐代之专门研究者的书文中无是类说这一前提。

二 从编撰工作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之背景上辨证

前面，我们已做了二项前提性工作；其一，证明了编《文选》之工作量远不如撰《文心雕龙》中相关之22篇的大；其二，注意到有关《文选》编撰之种种传闻随着“选学”之兴起而出，且时有从“敬爱上穿凿出来”之不实者。下面，别而究之。

（一）关于“繁重”“绵远”而“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说

近人何融在其发表于1949年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这一现代《文选》研究史上之重要论文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其云：

清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曰：“《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存三十卷。”

昭明《文选序》亦云：“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卷帙既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⑤

此中之朱氏说，乃袭元末赖良之说而来，然何氏及其后之学者多未之觉^⑥。赖氏自序其《大雅集》之“《昭明文选》初集，至一千余卷。后去取不能十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⑦云云，目力所及，就今存相关文献言，其盖明确说《文选》成书分二阶段而其工作量甚巨之最早者。不过，北宋《祥符图经》所记之“世传《文选》成，楼下所弃书与楼齐”^⑧说，盖为此类说之滥觞。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弃书与楼齐”云云这一殊为离谱者，在北宋祥符（1008—1016）前竟“世传”之，而不仅《祥符图经》主修人——北宋著名学者李宗谔未觉其非，其后引是书此语的金承安五年（1200）举进士第一之李俊民（1176—1260）亦然。

总之，粗一看，何氏之“其非”云云，似极是；然细究之，实则非也。不过，何氏是说与其引以为自己观点的主要文献支撑之清朱彝尊（1629—1709）“《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之不能成立，力之此前已论之^⑨，然其时尚未具体地从“编纂工作量”大小之层面与“敬爱上穿凿出来”这样之背景上展开研讨。而如此展开之研

①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卷八“地理类·《襄沔记》三卷”条云：“唐吴从政撰。删宗懔《荆楚岁时记》……鲍坚《南雍州记》，集成此书，其记襄、汉事迹详矣。（从政）景龙中人，自号栖闲子。”

③陈耀文《天中记》卷14“文选”条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9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611页。

④李俊民《庄靖集》卷六《文选楼》诗题下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339页。

⑤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76期（1949年2月）。

⑥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2《书〈玉台新咏〉后》隔七文即《赖良〈大雅集〉跋》（《四部丛刊》本），此乃明证。或以为朱氏是说本之吴械《韵补·书目》的《类文》下之“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谷所编”，非也。

⑦赖良《大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⑧《庄靖集》卷六《文选楼》诗题下引，第338-339页。

⑨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兼论何融〈文选〉“非一人所能完成”说之未为得》，《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讨,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故今拟从此层面与背景上略申说之。

关于何氏此文,王立群先生说:

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是现代《文选》学史最早研究《文选》成书过程、成书时间及编者的重要文章。……何融此文首先论述了他本人对《文选》成书于诸学士之手的基本观点,故文章开篇即曰:“梁昭明太子《文选》为一含有双重性的集体作物:就其内容言,系许多不同时代作家之作品集合物;就编辑方面言,又系许多同一时代作家之集体产品。关于前者,凡读《文选》者无不知之;但后者未被一般读者所留意。”在亮明自己这一重要观点之后,何融引证了三条文献记载,作为《文选》成书于诸学士之手的具体说明。第一,引用了清人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的一段名言:“《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存三十卷,择之可谓精矣。”又引《文选序》“远自周室,迄于近代,都为三十卷”之言,得出“卷帙如此繁重,年代又如彼绵远,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自甚明显”的结论。^①

王先生这一概述甚是得当(其说“何融引证”之“第二”“第三”与这里所论关系不大,不引)。又,当代学者而所持类何氏是说者,亦不为仅见^②。问题是,如上所述,随着“选学”之兴起,各种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亦先后出焉,而未免不实乃至不可思议者。如敦煌一本叫《杂钞》之小类书,内有一个约可代表公元781—996年内的“文化典籍的主要情况”之简单书目,其中提到《文选》,竟如是说:“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③不难想见,“召天下才子”云云,“盖其人生在《文选》大重之后,想象而为之的莫名其妙之说”也^④。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之《襄阳府·古迹》引旧《经》释“《文选》楼”云:

梁昭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选》。聚才人贤士刘孝感(“感”当为“威”)、庾肩吾……孔焯、鲍至等十余人,号曰“高斋学士”。^⑤

在南宋与其后之相关地志类典籍中,直接或间接地引此“旧《经》”之误说者尚多。而其影响所及,又非“地志”所能限之^⑥。至于此“旧《经》”具体是什么时候的,虽难以考知,然南宋人既称之为“旧《经》”,则其至晚亦应是北宋之旧物,且当早于《祥符图经》。当然,此乃因张冠李戴之所致。不过,“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所造成之“气候”亦给力不小——既助其“出生”,亦促其“成长”。而此类误说之影响,既广且久^⑦。结果是,至少在潜意识层面给人们以《文选》工作量之巨,非一己之力所能成这么一种殊为强烈之印象。上文提及之“《昭明文选》初集,至一千余卷”说,从文献之角度看,无任何支撑;从情理之层面言,比照《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等可比者,则可推知编撰30卷《文选》无“至一千余卷”初集之必要。其盖是从上述误说影响所形成之氛围中再度缘“敬爱”而“穿凿出”之又一典型者^⑧。因之,“繁重”云云,便失去了立之根据。至于何氏据《文选序》“远自周室,迄于圣代”而来之“绵远”说,孤立地看,似矣;然比照《文心雕龙》,却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之问题。后者“论文叙笔”部分之“原始以表末”的“始”“末”间更为“绵远”——刘勰是书所写的具体之作家与作品以东

①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37页。

②如俞绍初先生说:“阅读和搜集上下近千年的作品,无疑是一件旷日费时的工程,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在短时间内所能奏功,非依靠群体力量不可。”(氏作《〈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又,龚斌先生说:“据有些文学史家研究,《文选》编纂的时间大约在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之间,在短短的四年中,如果仅有萧统、刘孝绰编纂,是很难完成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所以,必定是许多人共同参与编选,讨论定夺。梁代多项文化大工程,如梁武帝制礼,敕众学士抄撰《华林遍略》,编纂《众经要抄》等,都集合文人学士、大德名僧,共同工作。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早在正式编选《文选》之前,萧统已在阅读前代文学作品,决定编纂《文选》时,集合刘孝绰等众多东宫文学之士共同遴选。”(氏著《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比观我们前文所述,是说显非圆照。以龚先生深厚之学养而如是说,盖缘一时疏忽所致。就“浩大的文化工程”言,30卷《文选》与700卷《华林遍略》,二者实在难以等而视之。

③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1页。

④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⑤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64-2665页。

⑥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⑦参: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

⑧参:力之《朱彝尊“〈文选〉初成闻有千卷”说不能成立辨》。

晋末为下限,而其《明诗》始“葛天氏”、《祝盟》始“伊耆”、《铭箴》始“帝轩”等等,即为明证^①。又,《文选序》说《文选》选文虽“时更七代”^②,然《文心雕龙》“剖情析采”部分之《才略》与《通变》分别论及“九代之文”与“九代咏歌”^③等等。

概言之,何氏之“卷帙既如此繁重”云云,一者所据非实,二者仅就《文选》以观《文选》而未能跳出《文选》以观《文选》。说到底,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相对应之“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及《才略》进行比观,更能说明问题^④。

(二)关于萧统与刘孝绰、何逊等编撰说

曹道衡先生(1928—2005)在20世纪90年代中曾说: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辑工作的记载,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而二书原文,都有“等”字,说明并非刘孝绰一人。这些人均属“文选楼中诸学士”之列,其地位与刘孝绰并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萧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略有不同,不能说他们一概都得听从刘孝绰的意见。^⑤

“主要只有”云云,时至今日仍是符合实际的。这“两条材料”即“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⑥。不过,由于后来发现中唐时人元宽《百叶书抄》已有“《文选》,梁昭明太子与(文儒)何逊、刘孝绰选集”(“文儒”原作“文孺”,是书“儒”多作“孺”)^⑦说,故这“两条材料”之后者出现亦甚早^⑧。因之,不言而喻,就通常之意义言,这两家说法由于去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时代不甚远,或有本之当时相关文献之可能。然结果到底如何,得注意其出现之背景,并将问题置于“网络”中考察,而非孤立地就此“材料”观此“材料”。

将问题置于“网络”中考察,尤需注意随着“选学”蔚然而兴,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便时有类前引《红楼梦》所说之“关夫子一身”而“有许多的坟”者。故此,这“两条材料”(《文镜秘府论》所引与《百叶书抄》所抄者)尽管均出现在唐前期,然因此间有《襄沔记》之“襄阳有文选楼……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一类“穿凿”之说在,故其可信度如何得细加辨析,而不能就通常之意义视之。问题是,持《文选》成于众手说之学者,似均就通常之意义视之而忽乎其本非寻常。此其一。其二,将上述二说置于“网络中”考察,二者均经不起推敲。首先,何逊已死于《文选》编撰前^⑨;其次,刘孝绰是唯一之为昭明太子编纂其个人文集者——“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故易误此为彼^⑩。否则,《梁书》本传何以仅记“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一事,而没有载其参编《文选》事?不仅如此,何以《梁书》《南史》与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注

①《文选序》尚有“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说,然《文心雕龙》之《才略》与《时序》分别有云:“昔在陶唐……暨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此不及齐代)。即两相比较,“七代”,长夫哉?

②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李善注本,卷首。又,后引《文选》而不标明者,均此本。

③《时序》之“蔚映十代”,可另当别论。

④详:力之、周春艳《比照〈文心〉以究〈文选〉之编撰工作量》(《将刊》)。又,关于何氏《〈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之得失,可参: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第六章之“《文选》成书与‘昭明太子十学士’”。

⑤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⑥前者,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后者,见王应麟《玉海》卷54“梁昭明太子《文选》唐李善注《文选》……”条引《中兴书目》的“《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等为三十卷”之文末注(广陵书社2003年版,影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第1017页下栏)。

⑦晏殊《类要》卷二一《总叙文》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67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2页。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为三十卷”之文末注的“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盖本之《百叶书抄》或《类要》。

⑧至于“文选楼中诸学士”一说,乃人们在不经意间“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的,而迄今为止之学者时或以之为“事实”。

⑨穆克宏先生说:何逊“未与萧统有过交往”,且卒时萧统“尚未开始编选《文选》”……《中兴馆阁书目》以何逊参与《文选》的编撰工作,可能因为何逊与刘孝绰齐名(并称“何刘”),连带而及”(氏著《文学研究》,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近是。至于周绍恒之“(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之诗写于普通三年之后,《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之诗写于中大通五年八月”(氏作《何逊卒年新考》,《怀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说,则未为圆照。如此前者之结论,乃因周先生未注意到《梁书》徐摛本传之“王移镇京口……带都令,以母忧去职”一事所致[详:力之《何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于何胤之时间辨》,《华夏文化论坛》第11辑(2014)]。即何氏显然是卒于萧统编撰《文选》前的。

⑩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

文选表》等无一如是说?^① 其实,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和昭明太子“造《文选》”本亦毫无关系,然如前所引,唐前期人或说“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而至晚宋初有学者说昭明太子聚“高斋学士”而“撰《文选》”^②。即误此以为彼:昭明太子出生于襄阳、“高斋”即在襄阳城内;萧纲于普通四年为“雍州刺史”(治所即襄阳),而据《南史》卷 50《庾肩吾传》,庾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③。两相比观,这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所引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说,正如出一辙。至于所谓之“等”,除了启部分学者之思而致其将两回事当一回事看外,更是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由“等”而将两回事当一回事看者,最典型的是说王筠参编《文选》。而其主要由即《梁书》卷 33 王筠本传所说之“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④,等等。如“选学”名家穆克宏先生说:

当然,参加《文选》编撰的也绝不止刘孝绰一人,王筠可能参与了此项工作。《梁书·王筠传》云:“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尚书令沈约,当世辞宗,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而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当世。”他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家令、太子中庶子,掌东宫管记二次。《梁书·王筠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王筠受萧统的爱重仅次于刘孝绰,他亦可能是《文选》的编选者之一。^⑤

穆先生既精于“选学”,亦深于“龙学”,然这里所说王筠之种种,均与王氏是否参编《文选》非一回事。难以思议的是,这竟是学界迄今为止普遍之看法。不仅如此,尚有更进者焉,如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云: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文选》三十卷的编纂是由昭明太子手下的、当时聚集于昭明太子东宫的一些诗文俊秀们共同参与而完成。这些诗文俊秀除了为首的彭城刘孝绰外,另有琅琊王筠、吴郡陆倕、彭城到洽、陈郡殷芸等。这种看法的根据是《梁书·刘孝绰传》的记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迁太府卿、太子仆,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⑥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与“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云云,其虽未必因之“敬爱”,然却恐难免“穿凿”之嫌。

总之,比照《文选》与《文心雕龙》之工作量和比照北宋初之前的“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之有关《文选》编者说,可进一步佐证“《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所说均不足信^⑦。换言之,刘孝绰参编《文选》说不能成立,遑论参编《文选》还有“东宫”其他学士说,遑论刘孝绰为《文选》之实际编者^⑧。

(三)从工作量大小之角度等证《文选》乃萧统独撰而非出于众手

这里,拟在前面研讨所得之基础上,再从工作量大小之角度等辨证《文选》乃萧统一己所撰而非出于众手。如上所述,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 22 篇之工作量,已比编整部《文选》之工作量还要大。基于此,若说刘勰撰《文心雕龙》非一切从“零”开始,其“选文以定篇”之“选文”多有“借助”其前类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论》等之“力”以成就者,那么,《文选》之选文何以不然?黄侃先生说《颂

①参: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又,可详参:梅运生(1932—2016)《萧统与〈昭明文选〉》,见《中国诗论史》(霍松林主编,黄山书社 2007 年版)上册第五章。

②参:力之《襄阳“文选楼”与“高斋学士”所属辨证》。

③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246 页。

④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485 页。

⑤穆克宏《文选学研究》,第 99-100 页。

⑥冈村繁《文选之研究》,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2 页。

⑦梅运生先生说:“由于此书的编撰,有范履冰、刘伟之参与,窃疑其言刘孝绰等参与编撰《文选》云云,是由此及彼的一种推论,并不一定有所依据。至于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在《文选》条下注言:‘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把与萧统无甚瓜葛的何逊也拉扯到《文选》编撰者的行列,那就更无从考实了。”(氏著《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 页)“并不”“更无”云云,甚是。

⑧详:力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中)。

赞》之“仲治论颂，多为彦和所取”^①，可谓得其实矣。如《颂赞》之“颂”的“选文以定篇”部分中之“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即本《文章流别论》之“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②而来。问题是，《文选·颂》所收之5首作品，其《赵充国颂》《出师颂》为《文章流别论》所论^③；《赵充国颂》与《汉高祖功臣颂》为《文心雕龙》所评；《酒德颂》，东晋戴逵《竹林七贤论》论刘伶录其文^④、《世说新语·文学》与颜延年《五君咏·刘参军》（“刘参军”即刘伶）分别有“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李善注：“‘颂酒’，即《酒德颂》也。”）^⑤之说，且后者见录于《文选》；至于《圣主得贤臣颂》，乃《汉书》卷64王褒本传所载褒文之唯一者，东汉荀悦《汉纪》卷20《前汉孝宣皇帝纪》亦载之（略有删节），《文章缘起》“颂”则以“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⑥为例等等。即《文选·颂》所录者均为“颂”类之名篇（《流别论》、《颂赞》不提及《圣主得贤臣颂》，当因其“体”之问题），而盖当时之读书人所共知。概言之，萧统之工作，没有任何非一切从“零”开始不可之理由，除非我们设想其愚不可及。问题是，《梁书》本传载其“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恒自讨论典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⑦。又，萧统《文选序》云：“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细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这二者不仅说明了昭明太子够聪慧，而且说明了就编撰《文选》言，其既具极好之客观条件，亦有主观上之理论自觉。即昭明太子同样懂得：要编撰好一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之理想选本，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前贤时彦之力方可。

又，饶宗颐先生《〈文心雕龙〉探原》云：

盖自《书记》而上为上篇，所以“论文叙笔”……彦和以前论文体者，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已极赅洽……然有一事为历来所忽略者，即分体之总集，至于宋齐，各体皆备，彦和席其成规，但加品鹭而已；毋庸蹉择而归纳之也。……是彦和此书上半部之侈陈文体，自非空所依傍，自出杼轴；其分类之法，乃依循前规，排比成编；加之仲洽《流别》，李充《翰林》，并有成书，矩矱具在，自易措手。《昭明文选》，成书更在彦和之后，其分析文体……乃远承往辙，与彦和取径，正有同然。^⑧

饶说多是。不过，在笔者看来，“已极赅洽”与“自易措手”云云，则似过矣。首先，《文心雕龙》并非一般单篇之随意安排；其次，并非各单篇均有所自之“已极赅洽”者。《序志》云：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⑨

总之，《文心雕龙》乃实实在在之“体大思精”者——“弥纶群言为难”，此“难”之分量，他人恐难体味。

至于萧统之编纂《文选》，不只“分析文体”与刘勰撰《文心雕龙》“取径，正有同然”，其所选作品与《文心雕

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页。

②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47页。

③《晋书》卷51《挚虞传》云：“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7页）此亦吾人当知之。

④《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条注引（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⑤前者，见《世说新语校笺》，第136页；后者，见《文选》卷21，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4页。

⑥任昉撰、陈懋仁注《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⑦姚思廉《梁书》，第165-167页。

⑧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文学评论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⑨《文心雕龙义证》下，第1931-1933页。

龙》“选文”之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亦无异。不仅如此,就后者言,刘勰所为比萧统所为之工作量更大,更复杂。因为前者所“选”时有非通常意义上之“美文”者,而后者则否。换言之,刘勰“选文”时或需在“类”中再辨其“体”,萧统“选文”则无此必要——比观《文选·颂》与《文心雕龙·颂赞》之“颂”的“选文以定篇”部分,思过半矣。

于此,我们须注意之前提是,“现存的梁、陈人的文集以及《梁书》《陈书》和《南史》各传,都无片言只字叙及他人参与编撰《文选》事,唐高宗、玄宗两代学人所注《文选》,都具表上闻,两表咸称原编撰者为昭明而不及他人”^①,而随着“选学”之兴起,唐宋间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往往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

总而言之,“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一类说法,显然是难以置信的;至于编《文选》,其工作量既然比撰《文心雕龙》之工作量小得多,那么,就此而言,萧统完全可以用一己之力完成之。不仅如此,如众所周知的,《文心雕龙》乃刘勰之独撰,且仅花四五年之“业余”时间便告完成^②。以此例彼,以前文所说之萧统之主观条件,其以一己之力完成比《文心雕龙》工作量远小得多之《文选》的编撰,当不会费同样之四五年时间。况且,《文选》可以“借”《文心雕龙》之力,乃至《诗品》的;反之,无法“借”。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

其一,编《文选》之工作量,被人们在以《文选》考察《文选》这一单一“线条上”放大了,且放大得时有未免太离谱而研究者往往以之为是者;跳出《文选》以观《文选》,便知编是书之工作量远小于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 22 篇的。即昭明太子以一己之力,完全能够完成 30 卷《文选》之编撰。

其二,唐人有“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与“《文选》,昭明太子与何逊、刘孝绰选集”二说,而将之置于其时有关《文选》编撰之传闻多有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等这一背景下作多维度之考察,便知这二者均经不起推敲,断难成立。考察问题,背景时有至关重要者,此其一也。

其三,从编撰工作量之大小和“与刘孝绰等撰”说出现之背景上细加辨证,结论只能是:《文选》乃萧统之独撰而非出于众手。而《梁书》及《南史》之昭明太子本传说萧统撰《文选》与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等无一说有他人参与,均可谓“实事求是”。

[责任编辑:唐 普]

^①梅运生《魏晋南北朝诗论史》,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212 页。

^②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所用时间,(清)刘毓崧氏之“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一四《书〈文心雕龙〉后》,民国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本),范文澜先生之“《文心》体大思精,必非仓卒而成,缔构草稿,杀青写定,如用三四年之功,则成书适在和帝之世、沈约贵盛时也”(《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31 页),杨明照先生之“前后相距,将及四载。全书体思精密,虽非短期所能载笔,然其杀青可写,当在此四年中”(《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5 页)诸说,均近是。又,牟世金先生在其《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推测是书“完成约需四年”,其云:“……全书三年左右可成。但这几年内不可能用其全力从事《文心》的写作,其间难免仍有撰抄佛经等事杂,所以,从 498 年开始,到 502 年三月完成,总计费时四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59、61 页)牟说亦可从。